

評 論

由《愛琳娜》電影探討臺灣底層的社會現象

Exploring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Taiwanese Bottom through the Movie *Elena*

林靖傑，2015，《愛琳娜》。新北：七霞電影有限公司。

蔡立旭 王居卿

蔡立旭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系博士班研究生。通訊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Email: stephentsai@yahoo.com.tw。王居卿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Email: chuching@mail.tku.edu.tw。

Li-Shih Tsai,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Tamkang University.
Chu-Ching Wang,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臺灣本土新銳導演林靖傑繼其先前知名作品《最遙遠的距離》、《尋找背海的人》之後，睽違了八年時間，對外宣稱斥資四千五百萬元拍攝的愛情劇情片《愛琳娜》終於在去年六月份在全臺灣各戲院公開上演，而放映首日臺北票房便突破百萬佳績，觀眾反映熱烈，許多觀眾邊看邊哭邊笑，看完後很多人鼓掌，表示非常感動。

《愛琳娜》本片入圍本屆「臺北電影節」最佳劇情長片，此片名取自臺語「愛人哪」的諧音，內容講的是親暱的愛人，和家人之間的故事。希望觀眾看完電影後，能延伸這樣的感受：自己的家人，自己關心的人，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都是自己的愛人。

談到此部電影作品《愛琳娜》的拍攝初衷，導演林靖傑靦腆地說：「我就是會不自覺把鏡頭轉向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講他們的美好、他們的無奈，還有他們用旺盛生命力所寫下的精彩故事！」。

「我不敢說我對社會底層很了解，但我只能說我來自那裡，所以對於那裡的敏銳度和同理心，一直都在。」這部電影可說是林靖傑自己生命歷程的翻版寫照，他出生在高雄，其父親在國營企業擔任勞工，家庭中有13個子女，只能盡量讓子女溫飽，以自由發展的方式讓孩子各自摸索、成長。

在其家中排行第9的林靖傑就讀大學時，靠著幾位已經在社會工作的哥哥們每個月各自拿出一千元或兩千元的資助，才能順利完成學業。在這樣的環境裡，他跟家人一起走過打拚時的酸、甜、苦、辣；看著周邊鄰居和朋友們的社會經歷；聽著每年參加勞工大遊行時，那些叔伯阿姨們爲了爭取權益，被迫走上街頭，這些都是《愛琳娜》的靈感來源。

此部電影之能夠打動人心，並不是其煽情的畫面或特效的動作，而是它傳遞著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情感。無論是對日常生活的臨摹描繪，或是對人情冷暖的深刻勾畫，此電影成功地結合藝術性、文化性、商業

性的影音美學樣貌，帶領觀眾走向在地本土社會的語境，這一位導演作了一次良好的示範。

從臺灣普羅市民角度，此電影能夠受到大眾迴響，和臺灣處於經濟低迷，以及對未來不確定的憂慮和恐懼有密切的關係，而電影的內容正好或明或暗地呼應了當時的集體潛意識。

《愛琳娜》劇情描述女主角陳愛琳出身社會底層家庭，她的父親是臺鹼工廠退休的工人，大哥是不務正業的流氓、二哥則是基層警察、三哥是經營失敗而破產的小型工廠負責人，她自己的教育背景中等，她做過非常多的工作，有紡織廠、零件工廠、製鞋廠、腳踏車工廠，也做過各式服務業，曾擔任過房務員、冰淇淋店員工、展場打工、發傳單工作等，領著相當低廉的薪資，卻付出極大的勞動。年齡已達35歲熟齡的她，在一次車禍中獲得賠償的機會，讓她獲得一份免費學習小提琴課程的訓練，如此因緣際會學會小提琴後，她努力的成為兒童基礎小提琴課程老師，心想著這樣就能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便開始奮力向上，為自己密集安排相親，期盼能嫁到好家庭，不僅希望找到愛情，還期望從此使其階級翻轉，飛上枝頭當鳳凰，也能讓全家人跟著雞犬升天，但是幸運並沒有隨之而來，現實生活中先是遇上曾以為是真命天子的高、富、帥男友，在得知陳愛琳意外懷孕後便避不見面，再後來是父親病重入院、兄長工廠經營不善倒閉，如此翻身的夢想破碎，無法使她翻身成為中產階級，而仍必須四處奔波，一樣勞碌，僅能靠著經常到婚喪喜慶場合去演奏小提琴來增加收入，整個困境迫使她徹底覺悟：不能再這樣等待別人的施予、不能再這樣頹廢下去！她在重挫的谷底體會到，只有找到自己的價值，才是最珍貴的資產。於是，她以琴身為盾、弓為劍，戴上面罩化身為蒙面女俠，出沒在都市裡的各個角落演奏小提琴後快速離開，以小提琴的琴聲，振奮捷運車廂裡疲憊的通勤上班族、聲援失業的關廠工人、挺身對抗都更財團、守護自己的家園，以此證明自己的價

值，同時為弱勢民衆聲援。她的現代蒙面女俠的身分迅速引起社會大眾關注，並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她為自己創造出生命的轉捩點，立志要為自己、家人、同屬弱勢階級的人們的幸福，扳回一城。後來她終於發現，期待已久的幸福就在自己身旁，那一位一直默默守候在身邊，跟自己一樣有愛心、好公義、有憐憫之心的計程車司機廖俊明，才是她真正理想的終身伴侶。

看完《愛琳娜》之後，發現整部影片中角色也幾乎都是使用臺語，其中一個原因是，主要角色來自底層的勞工階層（Argyle 1997: 25），在這樣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講臺語，另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導演想要很真實的把小人物草根性格表現出來，林靖傑導演認為，電影都應該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下，而不管是使用哪一種語言。

此部電影充分反映出在地語言特色與文化的價值，由於臺語是南部社會大眾主流的溝通語言，在提供此部電影給社會大眾的同時，臺語文化不但作為此部電影中的主流流行文化，同時維繫了高雄在地人的身分認同。影片中，透過臺語作為主要語言，呈現出高雄人的日常生活，並藉此劃分出社會底層群與中產階級在文化上的一些差異。同時臺語在形塑臺灣人的認同感上亦具有強烈的作用，比如在電影中使用臺灣口音與國語口音的角色，便具有不同的性格，甚至是刻板印象，而語言文化差異帶來的笑料或趣味也經常是此部電影的重要橋段。在此電影的流行之下，許多從臺語口語中產生的詞彙，更使得臺灣各地觀眾更為熟悉，甚至學習使用。

《愛琳娜》是一部寫實而具有階級意識（楊繼繩 2000: 395）的電影，應用戲劇的手法包裝劇情的轉折與進展，卻不落於抽象難懂、沈悶枯燥。無疑地它是一部精彩的電影，除了精彩之外，也被導演賦予了許多訊息和意義。其中有些部分顯而易見，例如小提琴，愛琳從工廠女工

努力變成小提琴老師，以求登上中產階級，然而最後始終未能如願。其實在現實社會中與女主角遭遇一樣未能順利階級翻轉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因為在經濟蕭條的環境當中，過去因經濟大幅度快速發展所帶來的階級變動的特殊現象，出現的可能性愈來愈小。過去曾經發生所謂的「白手起家」、「黑手變頭家」等快速致富的機會，已受到愈來愈多的限制。然而，社會一般民衆仍渴望獲得過去如此的機會，結果經努力過後卻仍然對現狀容易感到沮喪和挫折，可見階級之間的障礙極不易跨越。相反地，一個社會的上、下層級距離呈現出越來越遠、資源差異越來越大，表示社會的階層差異（三浦展 2006: 38）程度越來越高。如此的社會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Matras 1990: 3）的現象造成社會中少數人擁有不成比例的財富、權力、及聲望的情形。而如此的階級差異是造成社會焦慮的原因，也可能造成階級之間的不平等與衝突，而這一種負面情緒累積的結果也是可能導致日後發生社會運動的原因。

從這一部電影女主角所參與的社會運動現場，如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都市更新拆除現場、紡織工廠女工罷工現場，我們看到了政策缺陷不僅造就不正義、不公平，且總是藉由現代化發展、更新或滿足多數人利益的前提，公然地掠奪、侵蝕與壓迫弱勢者的基本權利，讓弱勢者不僅面對本身權益的不公平分配，更面對不公平的法令與體制，而成爲政策實施的受害者。就像此部電影中所出現的一個釘子戶家庭，無力對抗的便是以進步發展之名義堂而皇之的迫害，甚至對方可以派出警察來壓制，就算家庭內有成員擔任警察也無法與之對話，因爲基層員警就也只是政策執行的工具而已。而且往往愈是弱勢的群體往往愈沒有抵抗侵犯與壓迫的能力，更可能因強勢團體釋出眼前可能獲取短暫利益的機會，而接受其掠奪與剝削，心甘情願的出賣自己，甚至站在剝削者的一邊，這是強勢團體對對弱勢群體進行最徹底的迫害。

社會運動揭露分配的不公平及背後的社會歧視，某一些財團、企業藉由制度的缺陷、偏頗獲取利益，而弱勢群體則面對制度以及人權的侵犯與損害。此一部電影檢視臺灣社會不正義的現象，不僅造就土地、人權、社會的不正義，亦讓保障土地所有權、勞動權益成爲臺灣社會未來目標的理想受到質疑。影片中女主角到各種社會運動抗爭現場去力挺聲援這一些抗爭者，便似乎是在表達著如此的意念：在政府對各項人民權益保障的失能，任意令財團或企業對土地所有權剝削與勞動權益侵犯之下，只有公民的積極作爲與行動，才能促使人民權益的積極實現。

如同任何一個社會運動，每一起抗議者抗爭事件或集體行動都有特殊的意義，也都應考量事件或行動發生當時的脈絡。抗議者的行動經常被批評爲缺乏理性，但是對於資方的不當行爲，例如拖欠工資、拒發資遣費、惡意關廠，卻較少被輿論主動提及或受到嚴厲譴責。當然也不是當受害意識獲得合理紓解或平反時，求償與抗議本身才能算得上具有正面意義，因爲它至少公開揭露了原本隱藏在社會裡層的諸多嚴重問題和社會不公平的癥結，政府有責任要正視這一些透過社會運動發掘出來的社會難題。

從社會運動場合中的參與者成員當中，我們了解很多中下階層的群體都曾參與不同訴求的社會運動，屬於權力和經濟較弱勢的階層都有可能被動員起來，而成爲某種社會運動的潛在成員。因此，臺灣社會不再是一個被動順從的靜態社會，而是一個主動、有意見的動態社會。基本上，政府應該要有勇氣接受這一些社會運動的事實，認清今後的許多政策都將可能會面對一連串來自勞工階級的質疑或反彈，而且力量還會愈來愈大。壓力可能來自個別的勞工、某一個別的工廠或產業，甚或勞工團體（工會）的集體力量。換句話說，政府的決策者應該重視勞工爲政策實施對象的前提，尊重他們的意見和要求，並且給予充分參與政策的

機會。把勞工階級視為社會中政策的主要參與對象，勞工本身可以有正規通暢的管道，將心聲傳遞給政府，減少政府制訂出偏袒廠商或資方政策的缺失，更可避免勞工因管道閉塞而上出現過度偏激、極端的抗爭手段，去爭取和維護自身權益。

隨著社會日漸民主化，社會運動似乎也漸漸地拋棄了原先一些較為激進方式的抗議手段，改採取更多元化的抗議方式。在今天的臺灣社會中，社會運動已儼然成爲了城市街道所常態出現的現象。然而我們卻必須反思，如此現象所呈現出來的象徵意涵，一個社會運動得以出現，必須在某一些特別的社會環境之下。簡單來說，也就是在政府體制或國家政策發生失靈或出現缺陷的時候，社會運動才能夠成形，抗爭形式才得以出現。而一個社會運動成形或持續與否，也與外部所做出的回應有著絕對的關係，倘若抗爭者他們的訴求獲得充分的解決或正面的回應，他們的群眾便可能因此解散，那一種情況之下，社會運動便可能因此畫下句點。

此一部電影所反應的不是顯而易見的見解，而是一些集體意識的層面，以及意識層面以下的心態。導演透過角色人物演繹與回憶再現之模式，因而是社會層面真實的縮影，即便是電影出現的虛構情節，還是反映出對現代生活的觀察與對社會真實的體驗，其中有其特別的訴求與觀點。舉凡劇情中情節與人物安排、畫面影像、服裝造型等，無處不顯現社會大眾之集體意識與社會主體印象。這一些集體意識並非僅是粗淺的表面現象，而是開啓了解社會文化結構的關鍵，也是觀察社會脈動的密碼。此一部電影關注的是社會底層的真實現象和行爲，這一些現象和行爲並沒有體現社會運作模式下的公平正義，而是展現了缺乏公益的、很少被重視的，而且是潛意識下的心態，一些訴求、象徵以及文化現象的社會。

臺灣人觀看電影的品味與臺灣社會演變的過程有所關聯，從正面角度而言，這是臺灣電影必須如此進行的過程。然而全球影視文化的大量衝擊，造成本土文化邊緣化流失，當每一個國家積極在國際間展現自我文化的同時，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行銷商品，亦必須跟隨著全球文化的潮流前進，或許臺灣創作本土電影的草根性，可以為臺灣在亞洲地區的电影產業發展過程中，進行一次全新的蛻變。

社會底層人民過著卑微的生活，帶著許多無奈與感傷，仍一路向前不放棄追尋自己人生的幸福，在遭遇重挫的谷底後體會到，找到自己的價值，才是最珍貴的財富。「再怎麼廢的人生，也要奮力開出一朵花。」這是林靖傑導演希望觀眾看完電影之後都能得到這樣的體悟。儘管面臨嚴峻的競爭跟生存型態，希望喚醒臺灣人民，可以站出來一起來捍衛自己權益。因為心中有希望，未來才能有所改變。

臺灣底層人民的特徵是很有打拼的精神，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展現了那一份刻苦耐勞的堅強韌性。而面對社會的不正義、不公平，為了守護家園奮鬥，團結及參與、形成集體力量，在爭取權益的歷程中，彼此相互動員，眾人走上街頭抗議，表達心聲以及積極爭取修法，持續不忘初衷的表達訴求，努力尋求正義所在，與資方或財團、國家機器、社會制度對抗。

未來，在面臨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不穩定，以及工作貧窮普遍存在等問題持續的狀況之下，社會運動的角色除了在勞動權益的議題上繼續爭取以外，更進一步擴大社會運動的認同範圍，可以加入或籌組特定組織、社會團體，透過集體凝聚形成的力量，保障本身的基本權益，亦可以組成獨立的政黨團體，透過參與民意代表的選舉，成為能在議事場中為勞工發聲的民意代表，與目前既有的政治體制相抗衡。當我們看到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黃國昌、林昶佐、白色力量青年領袖洪慈庸一起步入立

法院的國會議場，我們便彷彿看見一道明亮耀眼的曙光照射出現在黎明的天空中。

儘管是社會底層，仍然充滿臺灣人的活力與熱情，展現了臺灣的生命力。而臺灣的生命力來自兩千三百萬人民，不管是市場的菜販、田裡的農夫、在鷹架上綁鋼筋的工人……，都是扭轉臺灣的力量。在這個關鍵的時代，相信人民的力量將成為轉化臺灣的力量。

作者簡介

蔡立旭，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個人研究領域為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行銷管理、幸福學、社會運動。

王居卿，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個人研究領域為企業政策、管理學、策略管理、服務業管理、服務業行銷、跨國企業經營專題。

參考書目

- 楊繼繩，2000，《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香港：三聯書店。
- 三浦展著、吳忠恩譯，2006，《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臺北：高寶國際公司。（三浦展，2005，《下流社会：新たな階層集の出現》。東京都：光文社。）
- Argyle, Michael著、陸洛譯，1997，《社會階級心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Michael, Argyle, 1994,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London: Routledge.）
- Matras, Judah著、李明譯，1990，《社會不平等：社會階層化與流動》。臺北：桂冠圖書公司。（Matras, Judah, 1984, *Social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